

中国二十世纪思想文库·新论语

严复语萃

马 勇 编

华夏出版社

中国二十世纪思想文库·新论语

严复语萃

马 勇 编

1993 年·北京·华夏出版社

(京)新登字 045 号

中国二十世纪思想文库·新论语

严复语萃

马 勇 编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 印张 152 千字 插页 2

1993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93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400 册

ISBN 7-5080-0146-x/Z·141

定价 0.60 元

中國二十
世紀思想
文庫

啓功題籤





严 复
(1854—1921)

总 序

张岱年

20 世纪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的转折时代。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受到资本主义列强的凌侵,全国人民奋起斗争,致力于救亡运动。20 世纪之初,孙中山先生发起革命运动。1912 年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辛亥革命虽然没有彻底完成任务,但是从此以后,谁要再敢建立帝制都成为不可能的了,这就是一个伟大的成就。1915 年陈独秀发起新文化运动,从此新的思潮风起云涌,对于陈旧的传统观念进行了猛烈的冲击。继而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李大钊等宣传马克思主义,发生了空前深刻的影响。

自 19 世纪中期以来,西学东渐,西方近代思想引起人们的注意。严复译述《天演论》,起了振聋启聩的作用,同时又广泛地介绍了西方的思想学说。梁启超更以通俗的文笔阐述新学,引起了青年学子的共鸣。章太炎鼓吹革命,也推动了历史的进步。“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胡适提倡文学革命,发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从而白话文代替了文言文的正统地位。在文学革命中成就最大的是鲁迅,在文学史上具有卓越的地位。

20 年代以来,文化问题、中西文化的异同,成为热烈争论的问题。胡适倾向于“全盘西化”,对于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认识不足。

梁漱溟起而以捍卫中国传统文化传统为己任。梁漱溟刚直不阿,表现了中国古代哲人的风范。

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疯狂侵略,国事日急。广大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奋起抗日。一些学者努力于学术救国,从事于新时代的中国哲学的创建活动。若干学人提出了自成一家之言的融会中西的学说体系,其中最有影响的有熊十力、冯友兰、金岳霖。这些学者的学说虽未必切合时代的需要,但其理论的深邃、论证的精密,与古代哲学家或西方哲学家相比,实毫无逊色,在中国学术史上应有一定的地位。

经过抗日战争及国内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起来了,彻底驱逐了外国侵略势力,保卫了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但是50年代后期,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文化学术又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史无前例”的所谓“文化大革命”更给文化学术带来了惨重的灾难。1978年党中央拨乱反正,于是文化学术走上蓬勃发展的坦途。现在到了20世纪最后七年了。在这七年中反过来再看一下20世纪思想学术发展的过程是有益的。总而言之,20世纪是中国学术思想上的一个辉煌的时代,学人辈出,群星灿烂,多家竞胜,蔚为壮观。

2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比较特殊和复杂的时期,在研究中国20世纪思想史以及评价20世纪思想家时,要做到全面、深刻、客观、公允,确是一件不容易但又意义深远的工作。

首先,是注意不要把中国20世纪思想史与中华民族在20世纪的全部历史隔离开来,因为思想史与文学史、社会史、艺术史乃至政治史都是中国历史的有机部分。同样,在评价中国20世纪思想家时,要注意不能脱离他所处的社会时代背景,一个思想家思想的产生、演变、发展及其特点,有其个人因素,也有时代因素。

其次,中国20世纪思想史是整个中国思想史的一部分,也是最“新”的一部分,我们应有历史发展和全面的眼光。我们现在已处

于 20 世纪的最后七年,研究这个世纪的中国思想史,既不能脱离 18、19 世纪乃至更早时期的中国思想史,又应注意中国 20 世纪思想史所具有的特点,还应想到为了下一个世纪中国文化思想的更新和光大。

再次,在研究、评价 20 世纪的中国思想家时,要注意实事求是,切忌把学术思想与政治倾向、处世方式相混淆,注意不同历史时期的学术思想之特点,把握学术思想演变中的主流,当然也要客观研究某些因素对其思想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客观地评估思想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及其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价值和意义。

“中国二十世纪思想文库编辑委员会”重点选择中国 20 世纪有重要贡献的学者为文化发展、民族振兴所作有意义的探索的思想成果,辑录成《新论语》丛书,每人一卷。编者均为国内学有根底的中青年学者。我认为这是一项有重要意义的工作,对于学术发展、文化建设将有重大的裨益。刘耿、王骏等同志希望我为这套丛书写一篇总序,于是略述个人对于中国 20 世纪学术思想的观感,聊供读者参考。

1993 年 1 月序于北京大学中关园

编 序

在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有一种令人吃惊的奇怪现象,那就是,一大批早年竭力主张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先驱,在经历了时间的流逝和人生的磨难之后,他们虽然对于西方文化有了更加深切的理解和体悟,但在他们的晚年,却自觉或不自觉然而却是毫无例外地由中国文化传统的反对者一变而成为颂扬者、崇拜者。这之中,最具有典型性的思想家当数严复。

对西方文化的体认与领悟

和近代中国一大批知名的思想家明显不同,严复的早年不是循着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成长路线前进,而是因各种机缘巧合而对西方文化有了比较早的直接的理解和体悟,是在接受或者说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西方文化观念之后再转向中国传统文化的。因此,我们分析严复的心路历程,便不能不从其独特的早期成长背景和道路说起。

严复于1854年1月8日生于闽垣南台一个医学世家,其父祖几代皆以行医为业,且名扬乡里。比较殷实的家庭条件使严复的早年有可能接受良好的系统教育,如果不发生意外变故的话,他完全有可能像他祖父几代人所期盼的那样,沿着科举的道路走下去,并最终获得某种功名,炫宗耀祖。早在他7岁的时候,其父亲严振光就让他外出求学,先后师从数人,可以相信严复由此已获得了某些最基础的知识。

和同龄人相比,严复算得上是一个早熟的少年,或许正因为这样,他的父亲才不惜工本为他延聘名师,着意培养。11岁时,严复正式拜当地名儒黄少岩为师,接受相当正规的传统文化的训练。作为当地名儒,黄少岩为学“汉宋并重,著有《闽方言》一书。课经之余,好与府君〔严复〕讲述明代东林掌故。”^①他言传身教,苛责甚严,从做人到为学都给严复留下了至深且巨的影响。于是严复“治经有家法,夙闻宋元明儒先学行。”^②奠定了由科举入仕的基础。

然而,正当严复在科举的道路上苦苦跋涉的时候,他却连遭不幸,并由此而中断了他的学业,使他科举致仕的憧憬顿时化为泡影。先是1865年,严复的塾师黄少岩不幸病故,这对严复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对老师的去世“哀恸不已。”^③紧接着,他的父亲严振光也在第二年不幸去世,年仅14岁的严复便因家境的突然变化而不得不中断学业,“家贫,不再从师。”^④

可以想象,对于一个勤奋好学,急欲上进的少年来说,中断学业是何等沉重的打击。因此,一旦有机会使他恢复中断了的学业,那么不论条件如何,他都会义无反顾地去追求。恰当此时,清政府鉴于国际形势的发展以及内部矛盾斗争的需要,已着手进行海军的创建。1866年,也就是严复辍学的当年,他的同乡沈葆楨奉命初创船政,招试英才,入马江学堂学习海军。严复因考试成绩优异,深获沈氏赏识,由此完成其生命历程中的第一次重大转折,由原先的科举之途转到尚不被社会承认和普遍尊重的“洋务”事业上来。^⑤

在马江学堂,严复接受了西方近代科学的系统训练,特别是由

① 严遽:《侯官严先生年谱》。

② 陈宝琛:《清故资政大夫海军协都统严君墓志铭》。

③ 王遽常:《严几道年谱》,第4页,商务印书馆,1936年。

④ 严遽:《侯官严先生年谱》。

⑤ 〔美〕本杰明·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第2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

于他和西方教官的直接接触，使他不像同时代的知识分子那样，对西学和西人怀有种族主义的成见，恰恰相反，他不仅对西学有了浓厚的兴趣，而且对西人也有了一种坦诚的理解。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他和西人直接相处的这几年，基本确立了他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对中西社会与文化的基本观念。我们相信，他之所以念念不忘曾和他相处一段时间的英人舰长德勒塞的那段临别赠言，显然是因为这段话对他此后的生命历程委实重要，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严复后来之所以具有如此成就的动力资源之一。德勒塞的话是：“君今日于海军学术，已卒業矣。不佞即将西归，彼此相处积年，临别惘然，不能无一言为赠。盖学问一事，并不以卒業为终点。学子虽已入世治事，此后自行求学之日方长，君如不自足自封，则新知无尽。”^①

或许正是遵循这种“新知无尽”的教诲，严复在结束了在海军学堂的学习，并已正式入海军服务，且成家生子之后，毅然于1877年奉派赴英国进修海军。

如果严复像他在马江学堂的同学们那样，一直把精力用在海军的业务上，那么严复可能只是一个或平庸或高超的中国海军的早期将领，他的历史也必将重写。然而严复的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他是带着全局的观念去观察东方和西方的。面对当时中国何以日趋衰败、西方何以逐步富强这样带有根本性的时代课题，严复决心通过对西方社会的实地考察来寻求自己的答案，作出自己的回答。因此我们看到，严复在英国进修的短短两年间，并不是把全部精力只用在海军的业务上，而是时常出入英国的法庭，观其听狱，以期从制度、法律和文化层面探求中西之间的本质差异和中国富强之道。据他归来后的回忆说：“犹忆不佞初游欧时，尝入法廷，观其听狱，归邸数日，如有所失。尝语湘阴郭〔嵩焘〕先生，谓英国与诸

① 严遵：《侯官严先生年谱》。

欧之所以富强，公理日伸，其端在此一事。先生深以为然，见谓卓识。”^① 这既是严复对于中国何以衰弱根本原因的探求，无疑也是他通过对西方社会的直接考察而建立的对西方文化的体认和领悟。由此，他似乎朦胧地意识到，中国欲富强，必须在更深的层面上，即在思想学术文化方面彻底抛弃中国古昔之“糟糠”，而代之以欧洲 19 世纪以来文化成就之“梁肉”。

仕途坎坷意消沉

严复在英国留学期间，曾与日本人伊藤博文等为同窗，伊藤博文归国之后，大展宏图，对日本的进步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可以想象，严复在 1879 年自英国归国的时候，确也曾想以自己的知识和智慧贡献给自己多灾多难的民族，确曾想过回来之后要大干一番，建立可以留传百世的盛事伟业。然而，在当时的中国政治体制下，个人的成就并不仅仅依靠个人的智慧和奋斗，而取决于许多复杂的外部原因，尤其是人事关系。我们知道，严复在此之前的那些年，他的政治靠山主要是沈葆楨，而恰恰在他回国的那一年，沈公不幸去世。政治靠山既不存在，严复只能另辟他途。时李鸿章经营北洋海军，对严复的才识稍有赏识，“伟其能，辟教授北洋水师学堂。”然而，李鸿章毕竟只是一个旧式官僚，他虽然器重严复的才学，但由于严复不是他亲手提拔上来的心腹，故而虽然不时给严复一些正常或超常的升迁，然而在严复方面的感觉只是“不预机要，奉职而已。”^② 以至若干年之后，当严复回忆起这些往事时，依然感到愤愤不平：“忆昔居英伦时，与日人伊藤博文氏同窗数载，各与国事皆有同感。然伊公回国后，所学竟成大用，而兄返国后与香涛都

① 严译：《孟德斯鸠法意》按语，第 224 页，商务印书馆，1981 年。

② 陈宝琛：《清故资政大夫海军协都统严君墓志铭》。

督首次晤面即遭冷遇。此后即始终寄人篱下，不获一展所长。相形之下，彼此何悬殊之甚耶？”^① 其愤懑、失望之情溢于言表。

沈葆楨的逝世，对严复的仕途构成重大的挫折，他在遭到了张之洞的冷遇之后，不得已转到李鸿章的手下任职。他既不是李鸿章的门生，也不是李氏的心腹，故而很难获得李氏的信赖和重用。他虽然多次努力改善与李鸿章之间的个人关系，李鸿章也确实接二连三地提拔他做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会办、总办等，但终究不能获得李鸿章的完全信赖。何以故？恐怕和严复本人的气质、性格及政治态度有关。我们知道，严复在英期间，曾获驻英公使郭嵩焘的赏识，二人引为忘年之交，“时延〔严复〕先生至使署，析中西学异同，穷日夕弗休。”^② 应该说，郭嵩焘对严复的性情最为理解，他在对严复为数不多的评价中写道：“又陵才分，吾甚爱之，而气性太涉狂易。吾方有鉴于广东生之乖戾，益不敢为度外之论。亦念负气太盛者，其终必无成，即古人亦皆然也。”^③ 严复后来的经历虽然并不像郭氏所预言的那样惨，但其“负气太盛”的性格不能不给他带来某些障碍。

事实上，李鸿章对严复的重用远已超过一般的部属，但是严复的性格与政见决定了李鸿章不可能将严复引为心腹和知己。我们知道，李鸿章是当时权倾九鼎的中枢人物，他既期望清朝能够繁荣、振作起来，但在本能上却也反感那些过分激进的主张。而严复，由于从国外学成归来，意欲一展宏图，既“慨夫朝野玩愒，而日本同学归者皆用事图强，径翦琉球，则大戚。常语人，不三十年藩属且尽，纆我如老牯牛耳！”^④ 如此激进的言论虽然道出某些真实，但对

① 严复致梁启超信，未刊件。

② 王允皙：《侯官严先生行状》、《清代碑传全集》，第162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③ 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第654页，岳麓书社，1984年。

④ 陈宝琛：《清故资政大夫海军协都统严君墓志铭》。

政治主流人物李鸿章来说怎敢过分接近他呢？

可以想象，仕途的挫折不能不引起严复的深思，但深思的结果，他不是检讨自己性情和政治态度方面的原因，而是认为自己毕竟不是科举正途出身，故而人微言轻，无法获得重用。于是在受到一些挫折之后，他并没有很快心灰意冷，而是将精力重新用在科举正途，以期获取功名之后，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地位。据记载，严复“自由欧东归后，见吾国人事事竺旧，鄙夷新知，于学则徒尚词章，不求真理。每问知交痛陈其言。自思职微言轻，且不由科举出身。（当日仕进，最重科举。）故所言每不见听。欲博一第入都，以与当轴周旋。既已入彀中，或者其言较易动听，风气渐可转移。”^① 基于此种考虑，严复遂于 1885 年回到故乡福建参加每三年一次的乡试。

不幸的是，严复的努力并没有得到预想的回报。他在接连三次的乡试中均名落孙山。这种失败虽然不能证明他的才智欠佳，但由此而造成的烦闷可想而知。为了摆脱这些烦闷，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我们看到严复一方面致力私人企业的投资，一方面却染上了可怕的鸦片瘾。^②

救亡与原强

严复思想消沉的根本原因不是自内部，而是外部环境使然。因此，一旦外部条件发生变化，严复便会从消沉中走出，而一展雄心。于是在 1894 年那个多事之秋尚未到来的时候，敏感的严复已充分意识到需要他发挥作用的机会来临了。这年春天，他接连完成《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重要论文的写作，遂使他很快成为举国知名的人物。他在后来回忆写作这一系列重要论

① 严琥：《侯官严先生年谱》。

② 〔美〕本杰明·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第 28 页。

文的思想动机时说：“甲午春半，正当东事臬兀之际，觉一时胸中有物，格格欲吐，于是有《原强》、《救亡决论》诸作，登布《直报》，才气茶不副本心，而《原强》诸篇尤属不为完作。盖当日无似不揣浅狭，意欲本之格致新理，溯源竟委，发明富强之事，造端于民，以智、德、力三者为之根本，三者诚盛，则富强之效不为而成；三者诚衰，则虽以命世之才，刻意治标，终亦堕废。故其为论，首明强弱兼并乃天行之必至，而无可逃，次指中国之民智、德、力三者已窳之实迹，夫如是，而使窳与窳遇，则雌雄胜负效不可知，及乎衰与盛邻，则其终必折以入。然则中国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存亡之数，不待再计而可知矣。是以今日之政，于除旧，宜去其害民之智、德、力者；于布新，宜立其益民之智、德、力者。以此为经，而以格致所得之实理真知为纬。本既如是，标亦从之。本所以期百年之盛大，标所以救今日之阽危，虽文、周、管、葛生今，欲舍是以为术，皆无当也。”^① 由此不难看出严复的思想动机和自负的信心。

面对两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严复相对说来不似当时另外一批思想家那样惶恐不安，他虽然具有同样强烈的忧患意识，但他毕竟基于对中西社会与文化的深刻理解，而相对坦然处之。他认为，中国之所以逐步走上衰败的根本原因，不是来自外部，而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客观历史规律即“运会”使然。他写道：“呜呼！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夫世之变也，莫之其所由然，强而名之曰运会。运会既成，虽圣人无所为力，盖圣人也运会中之一物。既为其中之一物，谓能取运会而转移之，无是理也。彼圣人者，特知运会之所由趋，而逆睹其流极。唯知其所由趋，故后天而奉天时；唯逆睹其流极，故先天而天不违。于是裁成辅相，而至天下于至安。后之人从而观其成功，遂若圣人真能转移运会也者，而不知圣人之初无由事也。即如今日中倭之构难，究所由来，夫岂一

^① 《与梁启超书》一，《严复集》，第513页，中华书局，1986年。

朝一夕之故也哉!”^① 显而易见,在严复看来,中国的发展与进步,不必寄希望于圣人出,而应从历史背景、文化背景方面去寻求其根本原因。这便是严复写作这一系列论文的根本主旨。

如果从历史文化背景看,严复认为中西之间的差异至为明显,“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粗举一二言之:则如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众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② 究其故,这种种差异虽是一种本然的事实,但并不能由此而断定孰优孰劣。也就是说,假如中国不与西方接触,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观念不对中国产生丝毫的影响,那么,中国必将按其固有规律继续发展,并将长此以终古。然而患常出于所虑之外,假设的东西毕竟只是一种假设。事实上,19世纪中期以来,不仅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观念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而且西方人由于源源不断地来到中国,其行为方式也对中国人产生莫大影响,故而由此才产生“我四千年文明声明已涣然有不终日之虑”这样严重的文化危机。

在严复看来,中国的文化危机是中国日趋衰败的根本原因,因此中国欲摆脱衰败而达富强,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首要的问题便是改变中国传统的文化结构,接受和吸纳西方近代文化中一切有

① 《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1页。

② 《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1—3页。

益于我的东西。他说：“时局到今，吾宁负发狂之名，决不能喔咻喁喁，更蹈作伪无耻之故辙。今日请明目张胆为诸公一言道破可乎？四千年文物，九万里中原，所以至于斯极者，其教化学术非也。不徒嬴政、李斯千秋祸首，若充类至义言之，则六经五子亦皆责有难辞。嬴、李以小人而陵铄苍生，六经五子以君子而束缚天下，后世其用意虽有公私之分，而崇尚我法，劫持天下，使天下必从己而无或敢为异同者则均也。因其劫持，遂生作伪；以其作伪，而是非淆、廉耻丧，天下之敝乃至不可复振也。此其受病至深，决非一二补偏救弊之为，如讲武、理财所能有济。盖亦反其本而图其渐而已矣！否则，智卑德漓，奸缘政兴，虽日举百废无益也。此吾《决论》三篇所以力主西学而未尝他及之者也。”^①也就是说，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必待中国文化实现转轨更新，“盖谋国之方，莫善于转祸而为福，而人臣之罪，莫大于苟利而自私。夫士生今日，不睹西洋富强之效者，无目者也。谓不讲富强，而中国自可以要；谓不用西洋之术，而富强自可致；谓用西洋之术，无俟于通达时务之真人才，皆非狂易失心之人不为此。”^②简言之，中国的唯一出路就是使中国尽早走上西方式的发展道路。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面对救亡图存的历史性挑战，严复的结论是中国必须尽早走上西方式的发展道路，这一点和同时代的进步思想家并无根本性的区别。然而，由于严复基于对中西文化的深刻理解，他所主张的向西方学习，又和同时的同类主张明显不同。他说：“今之扼腕奋舌，而讲西学，谈洋务者，亦知五十年以来，西人所孜孜勤求，近之

① 《救亡决论》，《严复集》第53—54页。

② 《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4页。